

憶
念
戴
笠
將
軍

陳 祖 康

中國情報工作創始人

無論世人對戴笠將軍如何批評，我也不因為是戴笠將軍的部下而有所偏袒。戴笠將軍確是中國近五十年代的一位雄才，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的傑出的表現，他對國家的勳勞，彪炳千秋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

戴笠將軍是現代中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，如果不了解情報工作的性質，就不能了解戴笠將軍。

一般人談到情報工作，大有「談虎變色」之概，以為情報工作所包含的就是「恐怖」兩個字，這是大錯而特錯的。

然而情報工作是什麼呢？

情報工作的性質有三個重要的目標：

1. 維護國家與國家領袖的安全，凡是有危害到國家與國家領袖安全的任何陰謀與行動，情報工作機構必須負責予以防範與遏止。

2. 維護社會與善良人民的安全，任何足以損

害社會秩序，及善良人民安寧的事件，情報工作機構必須設法予以調查消除。

3. 維護法律的尊嚴，法律是安定國家，安定社會，保護善良人民的主力。情報工作機構必須使法律受到無比的尊崇，而不容有絲毫的動搖。

這三項工作，本來每個國家的政府中，都有許多的機構負責辦理。以我們中國來說，法院、憲兵隊、警察機構都是經常辦理這些工作，但是，政府普通機構祇能辦理已發生的事件，而不能處理未發生的事件，同時也祇能辦理國內的事件，而不能辦理國外的事件，而且普通機構祇能辦理與本機關有關的事件，而不能辦理比較關係複雜的事件。何況普通機構所辦理的日常事件繁多，無力再辦理其他額外的事件。情報機構則不然，它的工作是包羅萬象，無所不管，可以管國內，也可以管國外，可以管人民也可以管官吏軍警，通常都在秘密中進行，常能弭害於無形，而使國家人民獲得利益而不知。所以，近代的國家，都有情報機構的設立，絕無例外。

因此，擔任情報工作人員，如要能達成任務，必須有三項條件：

1. 優良的品格：有優良的品格，才能正己以及人，否則顛倒是非，藉機作惡，其害有不堪言者。

2. 高超的智慧：有高超的智慧，才能有精確的判斷，以及充分的胆識以應付任何困難，否則遭人愚弄，甚至於落入對方陷阱而不覺，以至於憤事。

3. 卓越的技能：做為一個完備的情報工作人員，必須有各種各式的技能，足以應付任何臨時發生的事件。技能是由訓練而來的，凡是一個情報工作人員，在這方面都要接受嚴格的訓練。

除了上述三項條件以外，凡是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員，都要心存作無名英雄的打算，因為工作是秘密的，成功失敗也是秘密的，且有時必須冒無窮的危險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，犧牲小我成全大我。犧牲後，自然而然是無名英雄。茲姑舉一例以明之。在抗日戰爭中，戴笠將軍的

部下，有昭著事實與壯烈犧牲的就有五千多人，這五千多人的遺族，雖然受到國家的照顧，但這五千多人却不為國人所週知。所以這五千多人就做了無名英雄。戴將軍曾說過：「我們的光榮歷史是同志們的血、汗、淚所造成的」，此語毫無虛假。

所以，從事情報工作人員絕對不是紅眉毛綠眼睛的一類人物，而必須是志士仁人，當然，我也不否認為了某一種特殊工作的需要，情報機構必須運用、僱用、甚至於豢養一些品格比較差的人，以達成工作，這正如在兩軍陣前，凡可以打擊敵人的手段，都要予以運用，但這不過是一種

臨時措置，而不是將他們納入情報工作人員行列之內。

如何領導工作人員？

情報工作人員既然是一批仁人志士，那麼領導這一些仁人志士，就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辦法，否則必不能得到仁人志士的歸心。本來，無論領導任何一個團體或一個機構的工作人員，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，只要領導人做到「公」「誠」二字，便會無往而不利。

我們且看戴將軍如何領導工作人員。戴將軍除了做到「公」與「誠」這兩個字以外，還多了

一些別的。據我個人所知道的，列出以下各項：

知人善任：戴將軍對於任用一個工作人員，

必定經過深入的觀察與了解，知其長處，並知其短處，自然是用其長而摒其短。但有時也能遂其所短，以便能加強發揮其所長。我記得有一次，

戴將軍已定期招待一位由西北來的同志，但臨時戴將軍有要事不能分身，要我代他赴約，並且指示我：「這位同志很能幹，工作也好，但他很要錢。你問他的工作費用每月需若干，回來告訴我，我會加倍給他。希望他能更加努力」。這件事

說明了戴將軍除了公與誠以外，還能寬諒人家的短處，替部下解決問題，使其受感動而努力工作，達成任務。戴將軍對我這一段話時，面含微笑，眼含徵詢的意見，我也就一笑作罷。

不邀功，不諉過：無論任何一項工作，尤

其是情報工作，成功既不可必，失敗亦是意中事。普通一般人，成功則歸諸己，失敗則諉諸人。尤其是過去我國的政治場合中，常常瀰漫着官僚習氣。這種情形已是家常便飯。但戴將軍恰恰相反，凡是成功都歸諸上級與部下，失敗則自己承擔，絕不埋怨，不反悔。當然，如果工作人員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，自然得接受相當的處分，絕不枉縱。我記得在廿七年春，我與當時福建省主席陳儀的一段糾葛，我雖受了半年的禁閉，我却心平氣和。事情是這樣，陳儀因在我前任張超手內，吃了不少虧，積怨正深，竟然佈置了一個陷阱，誣指我的部屬莊駿烈貪污，以駐閩綏靖主任名義，下令將其拘捕，聲稱將予槍斃。我當時向陳儀表示抗議：「要槍斃，祇能槍斃我而不能



現代中國情報工作創始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戴笠（雨農）將軍。

槍斃莊駿烈」。陳儀本來想以此事來要脅我，使我以後聽命於他。曾三番兩次托人告訴我，只要我肯向陳儀道歉，並保證以後合作，就可以釋放莊駿烈，而消滅此案。我堅不應允。陳儀乃將此案報告中央。中央令陳儀將莊駿烈押送中央，而我亦同時奉命離閩。我到達長沙後，即遭禁閉。不久，徐羽儀法官來同我談話時說：「奉戴先生諭要我告訴你，你在福建的事件，風骨嶙峋，是有功而無過，但爲顧慮到目前的抗戰環境，我們不能不敷衍陳儀的面子，委屈你暫時休息一個時期，如此而已」。談到所謂目前的抗戰環境，這裏還有一段事實。在莊駿烈案發生的期間前不久，福州的郵電檢查所曾檢到由香港寄給陳儀的一封信，信是台灣軍總司令牛島滿寫的。信內的意思說：「皇軍不來攻福建是閣下的關係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請與皇軍合作，否則就會做韓復榘第二」。我們檢到此信後，即拍照密呈中央，一面將信照交陳儀。陳儀接到信後，並未報告中央。但中央有電查問此事，陳儀接到此信後，乃急將其日籍太太送往長沙，表示忠心不二。當時，如果陳儀投敵，中央鞭長莫及，亦無可如何。後來抗戰局勢轉變，對陳儀已無顧慮。不僅莊駿烈無罪釋放，而我也於廿七年秋恢復任職。這一個我與陳儀糾纏的事實說明了什麼？說明了戴將軍不諉過部下。因當時，如果拿我與陳儀比較，奚啻霄壤，照普通人的做法，儘可以犧牲我而取悅陳儀，而且社會上也不會爲我計較是非的。

(三)一視同仁：在戴將軍領導下的工作人員，有不少在參加工作以前，與戴將軍是站在敵對地

位的，但戴將軍一經邀請參加工作以後，便一視同仁，與原來工作人員不分軒輊。這裏，我談談參加戴將軍所領導的工作的經過。我於廿三年春，於閩變後，定居長沙，萬念俱灰，對政治方面已感絕望。蔣百里在國防論中說過，中國智識份子最高的理想只想到位列宰相，我則在政治方面理想太高，絕不甘心做宰相的，因而對失敗的滋味，所感受的更爲消極。到長沙後，日惟縱酒、打麻將。連報紙都不看，那時有一個黃埔軍校五期學生范裕厚，在長沙警備司令部任職，同時也是戴將軍的工作人員，經常與我有來往，自然也含有偵查意味。我也很坦白表示，當心情好轉後，決心做一個文人，以了此生。到了廿五年春，范裕厚力勸我參加救國工作，並說明 蔣委員長已決心抗日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貢獻其所能。我告訴他：如果抗日，我當全力以赴。後由范裕厚介紹我與吳廣恕長談，乃加入戴將軍所領導的工作，在金遠詢指揮下工作。廿五年夏，西南事變發生，我曾到湘桂邊境的零陵，做了一些工作。事變平息後，即奉派赴福州，在警官訓練所任教官兼政訓主任。廿七年七月上廬山受訓，至十月間，因原任閩北站站長張超，與閩主席陳儀磨擦太多，戴將軍乃調張離閩，而令我繼任。以我當時在這一團體中的歷史，無論如何是不能一下就得到站長的位置，但戴將軍却令我當此重任，這足證明了戴將軍對部屬一視同仁的精神。

厲行督察制度：普通警察機構，爲督察警察勤務，設有督察制度。而在戴將軍所領導的工作，督察制度是維持這個團體紀律的靈魂。督察

人員是在秘密情況下，專任督察全體工作人員的一切，由工作情形而至於私生活都在範圍之內。而擔任督察工作的人員，必須是千萬中選一的品德優良者。例如清風亮節的廖華平，淡泊明志的郭履洲，均先後任過督察主任。另則所有工作單位的移接，都必須有督察人員參加證明，當然這個督察工作是對內而不對外的。

戴將軍派我到敵後

現在談談我與戴將軍接觸的經過

說起來很難令人置信，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前，我與戴將軍只見了幾次面。第一次見面是最微妙的一件事，我於廿七年秋由漢口撤退到長沙辦公，在長沙大火之夜，我們奉命由長沙的朱家花園撤退到湘西的沅陵。當時，兵荒馬亂，到沅陵後，我與一部份工作人員寓在沅陵城外呂公坪的一個祠堂中。有一天清晨。我起身後，忽然看到有三個人，行色匆匆地由門口進來。其中有一個是徐光英（廣東潮州人，原名樹屏，畢業於法國聖西陸軍軍官學校），我看到他後，就與他握了手，對另外二人沒有理會。其實其中有一人就是戴將軍，戴將軍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看他一眼。其實那時候，我根本不認識戴將軍。我彷彿覺得那另外一人看我的時候，略現詭異神色，後來，我便退開問旁邊的同事他是何人？才曉得是戴將軍。以後由沅陵到貴陽、重慶，而至於成都，除在辦公處瞥見過一兩次戴將軍後，就沒有機會見面交談。一直到廿八年秋，我奉命由成都飛重慶被派赴上海工作時，才在重慶與戴將軍見了數次面，

而有所交談。

說到離開成都時，有一件小事，值得一談，我個人始終不相信中國人算命看相這一套。可能在古老的時候，應該有科學根據的，現已失傳，使我無法相信。我在成都時有一位同事徐一覺，他迷信看相，有一次我被他邀到一陳姓友人（忘其名）家中，有名的看相家。但看相之餘，我發現了陳姓看相者，豪於酒，因而結成酒友。他歷次向我津津有味的談到看相的「五行之學」，我只說：「你看你的相，我喝我的酒，你說的天花亂墜，我也無興趣」。所以，以後二人對喝時，他不向我談看相的事。到了七月間，有一次在對喝當中，他注視我很久，我問他有什麼不對，他笑說：「你最近應該儘量多喝點大酒，恐怕不久以後，你沒有機會了」。我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秋天必須離開成都。」我聽了以後，暗自思量，找不出離開的理由。我說：「我不相信。」他說：「如果你秋天不離開成都，可以砸我的招牌，從此不看相。」我說：「你何以如此自信？」他說：「你的驛馬星動了，這是我心靈的感覺，我也不曉得什麼道理，但你秋天一到必須離開成都，則絕對不錯。」我笑了，也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，到了立秋前十天，我就問他：「再十天就立秋了，你看相不靈了。」他說：「不要急，還有十日。」果然立秋前一日，我接到離開成都飛重慶的電令。這個事情，我老是橫在胸中，我至今還不相信看相，但我至今也仍不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我飛到重慶的第二日，戴將軍即在重慶海關

巷二樓接見我，見面寒暄後，他劈頭就問我，「請你到上海去，去不去？」我毫不考慮地答說：

「我沒有什麼不可以去的地方，祇要你認為合適。」不過我當時提出，工作到抗戰勝利為止，抗戰勝利後要讓我自由做任何事情。戴將軍即笑道：「抗戰勝利是我們工作的最高目的，我曉得，你不要名，不要利，為的是國家，不過，未來的事變化多端，誰能確實料到以後的事。但你放心，我對你的諾言，一定遵守。」事後，我會晤到許多同事，才曉得，因為上海工作繁忙，原有上海區不敷應付，所以把原有的上海區改為滬一區，而新增滬二區，由姜紹謨任區長。而由姜紹謨提出由我充任該區書記。數日後，戴將軍又約我到其寓所吃飯，到達時，始發覺客人除我以外，臨時尚有一位由山西來的工作同志參加，他任山西某區的專員，是一個大鬍子。照例，戴將軍既沒有替我們介紹姓名，我們自己也不動問，大家只有埋頭吃飯，雖汗流浹背，祇好忍受。吃飯時，自然除了幾句禮貌上的話外，什麼都不說。又數日，從同事處傳來的消息，謂戴將軍在紀念週上，對我有好的批評，並且指責人事主管，有如此好的同志，平時都不注意發掘！以後，應向這方面多留心，以免人才失之交臂。我聽了以後，自己想想，我有什麼好處，值得戴將軍稱讚。可能是對我一種鼓勵。但是不管那些，等候赴上海工作就是了。在待命期間，我住在重慶小梁子英年會旅館，其時我未來的岳父宋淵源，恰住在對面，原本相識，旅館中頗不寂寞，每當夜間十一時左右，即相率到川鹽銀行躲避

警報，因那時候，日機都在月夜襲擊重慶。事隔三十多年，家岳既已作古，我亦垂老，思之不禁惘然！又數日後，赴香港的各種手續，及飛機票亦已送到。戴將軍並通知：動身那一天上午，他會派車來接我至他的寓所，再送我至珊瑚壩機場。

因而動身那一天上午，我被接到戴將軍寓所，我當即問有何指示，戴將軍說：「大家努力，希望勝利後在上海見面。」其實，這兩句話，在那時不過是一種預祝的意思，誰也不曉得，我們能不能勝利？何時勝利？勝利時我們能否存在？可是這兩句話，在六年後都成為事實了。當日下午一時許，戴將軍送我到機場，離飛機場約一箭地的江邊，他就停車，由一個親候在該處同志導我至機場，過一時，飛機尚未啓行，忽由機場一個同志對我說：戴將軍請你去場外一晤。至時戴將軍以小罐鹽菜交我，要我到香港交給王新衡，裏頭是什麼東西，我不曉得，當然我也不問。當晚飛機到達香港後，第二日便將那小罐給王新衡，就算了事。

卅四年八月，勝利的鐘響了，我在上海工作，幸未辱命，而我自己深深可以自慰的，即是我單位下的全體工作人員，完整無缺，且未受任何其他損失。九月九日戴將軍在杜美路七十號（此房係由金庭蓀贈贈杜月笙的）約見我及我的副手姜紹誠。見面時，彼此握手言歡。我就笑向戴將軍說：勝利到了，我可卸職了麼？戴將軍也以愉快的的心情答覆我：「這還不容易，可是還要搞半年，此事暫緩談。今天我約你們來，有話同你們講。」戴將軍隨即正容說道：「我們目前有兩大

工作必須全力做到，第一要護法，即是保護法律的尊嚴。今後我們的國家，必須實行民主政治，守法是民主政治的靈魂。第二是反共，這個工作是迫在眉睫的，首先要防止共匪武裝力量的集中。國軍在勝利後，戒備必然鬆懈，就要看我們的作爲。至於目前，我們在這地區的有機構，包含倉庫，要慎防共匪破壞。此點不能絲毫失誤。」說了這些話後，我當時心內起了一陣無名的激動，甚而熱淚也掛在眼膜，因爲，我認爲戴將軍這種爲國家而統籌全局的偉大卓見，真使我由衷的佩服。較之，當時所有政府的各機關，派到上海的人員，只知搶接物資以外，別無所事。其間實在距離得太遠。

戴將軍到上海後，爲了全面展開工作，同時奉有全權處理有關漢奸方面事務的命令，乃成立了兩個機構：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上海辦事處，一個是中美合作所上海辦事處。此兩個機構實在是一體，主任一職均由戴將軍自兼，調查統計局辦事處由龔仙舫以主任秘書名義任幕僚長，中美合作所由李崇詩以參謀長名義任幕



民國三十七年四月本文作者陳祖康將軍在南京留影。

僚長。以下的各部門均是兼任，我當時奉調兼任督察組長。這兩個機構均設在杜美路七十號。戴將軍於成立機構之前，曾召集在上海的中上級工作人員，濟濟數百人，在杜美路七十號聚餐，聚餐時，戴將軍以愉快的口氣，宣佈了幾點指示：

① 抗戰勝利是我們領袖委員長 蔣公堅苦卓絕所領導的結果，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空前的偉業。我們在上海必須更加體會領袖的意旨，更加努力發揚我們的清白家風。因爲這個十里洋場，實在是一個大染缸，稍一不慎便會變色，大家要注意保持自己清白之身，才可以示範他人。

② 抗戰勝利後，我們的工作將更艱鉅，因爲我們當前的敵人——共匪，較漢奸更難應付，若不能消滅共匪，勝利的成果便要落空，大家要全力共克。

③ 這裏的房子（指杜美路七十號）是杜月笙暫借我們，我們除對他表示感謝外，要注意，不能有絲毫污損。

我在聚餐時，碰巧與戴將軍同桌，故而聽得比較清楚。照例，戴將軍同工作同志聚餐，除爲他留一主席位置外，其餘先到先坐，各憑自己的方便，那一天，因爲我到的稍遲，除戴將軍桌上有幾個空位外，其餘都坐得滿滿的，我只好擠到那一桌上，現

在戴將軍及龔仙舫已作古，卅年真如一場夢。

杜美路的辦公機構成立後，我們每天在辦公桌上要坐十二個小時，每日必須到深夜十二時，始能休息。然而，以我來講，有時還不能休息，因爲，對於漢奸嫌疑犯的房產及其他財產，必須看管。戴將軍爲了此項工作，動員了全國訓練班學生，負擔這個任務。依規定，每個地方必須有兩人以上，看守人員除在房屋內客廳或其他空隙處打地鋪外，不能改變其原來現狀。房屋內如尚存有漢奸嫌疑犯的家屬者，仍可自由出入。所以，我於下辦公後，有時還得去這些地方查看。戴將軍本人有時也去查看，查看時，經常發現了笑話。因爲所有訓練班學生，都是由內地去的，根本沒有接觸過大都市生活，有人將人家客廳上洋酒開了就吃，但我們對於這些小過失却不放鬆，一律予以禁閉。當然，這些被禁閉的看守人員，略予薄懲便開釋了，仍照常服務。

爲了處理繁忙工作及力求時效，戴將軍規定辦事處的單位負責人，與在上海區域內外動各單位的負責人，每日中午，必須在杜美路七十號午餐，並舉行會報，在會報後立即決定各項工作的處理辦法。所以，當時大家都覺得這一餐飯很難消化，有時會弄到下午四點，還沒有吃完。不過，在這段期間內，我與戴將軍日日接觸，因而更加深刻地了解戴將軍。以下，就是我當時對於戴將軍的幾項觀感：

我對戴將軍的觀感

① 戴將軍對於處理事務，確是合情合理。決

定的辦法，可以使人心悅誠服，且又從不強人所難，而有濃厚的人情味。並不如想像中，情報工作人員的冷酷作風，這一點是我以前所沒有想到的。

②戴將軍對領袖的忠誠，不僅是肝腦塗地，而且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偽，他常說：「領袖的意志，便是我們的意志，遵行領袖意志辦事，絕不會錯。並且領袖是統籌全局的，我們不能以局部的觀點去臆猜統籌全局的觀點，令到即行，就是我們的職責。」我這裏舉一個繆斌的事件做例子。在一次中午聚餐時，戴將軍問：「繆斌是何人聯絡的，何以未見此人。」劉方雄當即答稱由其聯絡。戴將軍即囑劉方雄：「應當去看看人家，人情禮貌都應如此，其他的事過後再談。」不數日，戴將軍奉到電令，應將繆斌捕訊。戴將軍仍將該電全文交劉方雄辦理，並笑對劉方雄說：「人情禮貌是一個問題，功過是一個問題。領袖的命令只有澈底執行。」

③戴將軍不僅注意大事，而且注意小事。例如他所用的信封信紙，必須由總務人員專職辦理。他的要求，是信紙折疊後納入信封，必須絲毫無差，倘不符合便不用。總務人員覺得對於信紙信封何必如此認真，戴將軍對他說：「我們做事要求精確，稍不精確可能發生偏差，甚至影響工作，我對信紙信封的苛求，是要訓練你們能夠精確。我都不怕多花錢，你怕什麼麻煩？」又三十四年雙十節將到時，戴將軍通知我們，凡參加慶祝會的人員，都要穿中山裝，沒有的需要趕做，這不僅是國家的體面，而且是我們對自己國家的信

心。

④戴將軍對認為必須做的事，鏗而不捨。絕不因困難而放棄，絕不因失敗而灰心。當時這類的事例很多，不勝枚舉。

⑤戴將軍明辨是非，不枉也不縱。在一次會報中，戴將軍突然聲色俱厲地向我說：

「你的漢奸關係太多，實在够麻煩。」我一時不知從何說起，祇好答稱：

「我是奉命在漢奸窩內打滾的，且所運用的人員，均奉電令一一批准，我均有電令為證——我尚未說完，戴將軍即顧左右而言他。事後，我始悉有人說我庇護漢奸，其中最主要的為陳伯藩及唐海安，此二人均在抗戰勝利一年前奉令准予吸收運用。勝利後，我曾向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證明，因而二人獲得無罪。其實用此二人，均

由同事介紹。陳伯藩於出任汪逆偽政府派任駐滿洲國大使時，見過一面。唐海安則於其被判無罪後，始獲一面。根本無一點私交可言，更談不到其他。

在民國卅五年初，各事已略有頭緒，戴將軍乃於一次會餐中，向我們宣佈兩件大事：一個是為阻止共匪力量的集中，必須使五十萬偽軍立功贖罪，就是說凡能反共的偽軍，既往不咎，且予以扶助；如吳化文、孫良誠、郝鵬舉等，多保存一點國家元氣，及減少無謂的困擾。漢奸問題以政治解決，就是說對漢奸情形分別予以處理，不用固定的法律手續。並說已做好簽呈送呈領袖核批，批准後，我們即可進一步向建國的事業邁進。但不久以後，戴將軍不幸在南京上空遭難，一代雄才，甫到半紀之年，便永埋黃土了。（完）

王道等著 中外珍聞 第二冊

「中外珍聞」內容包羅萬象，文字精采百出，每篇各成單元，全書富有歷史價值，百讀不厭，第二冊要目：王道：九九日軍投降記。

蔣君章：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。郭岐：南京大屠殺。趙宗鼎：憶戰時陪都重慶。褚問鵠：羅卓英揚威域外。費雲文：戴雨農與鄭介民。喬家才：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。第一冊尚有存書欲購從速。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